



补上这堂国学课

姚雪痕

“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是引自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二卷作文题目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出自何处？作者是谁？估计大部分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段话出自东汉时期的一部巨著《风俗通义》。比起《史记》《汉书》，这本书比较冷门，读过的人不多。不过，它在史学和民俗学领域名气却很大，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考辨风俗民情与名物制度的杂家著作，是今天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民间信仰与礼俗变迁不可替代的原始文献。将其中的一段话作为作文题目，足以见得基础教育对国学传承的重视。

作者应劭出身汝南应氏。他的父亲应奉记忆力超群，有个成语叫一目十行，他能一目五行，不仅看得快，记得也准。他担任决曹吏时，将上千起案件记得一清二楚，无一遗漏。

受父亲影响，应劭自幼博览群书，尤其擅长文学研究、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据《后汉书·应劭列传》记载，他一生著述136篇，包括《中汉辑序》《汉书集解》等，可惜因为战乱大部分已散佚。据传，《风俗通义》传至隋唐时还有32卷，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苏颂取官私藏本互校，考其篇目，仅余下10卷。

应劭所处的时期正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年代，动荡不安的时局，让原本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社会文化体系遭受重创。社会文化的凋敝，导致不少歪理陋习在百姓间传播蔓延，持续败坏社会风气。

任泰山太守期间，应劭便留意到治下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什么淮南王刘安白日飞升成了神仙，汝南郡汝阳县的石人能治病，襄阳的鲍君神是一条能变鱼的，南顿的李君神不过是株李子树，云云。不仅百姓深信不疑，就连一些有识之士也信以为真。

在这种背景下，应劭决定写下这部《风俗通义》，针对人们对典籍的错误理解、史书中的误记滥记、捕风捉影的不实传闻、鬼怪神妖的灵异故事等，以史家笔法进行归类、分析、思考、阐释，以古论今，依今推古，遍考典籍，察其始终，正其名实。因为书中记述了许多精怪故事和士人言行，类似后世的志人小说，清代龚自珍将它称作“小说之祖书”。

另外，我还推荐你们去读《汉代风俗制度史》。这是翟翊园研究汉代社会与文化的一部著作，今年出了再版。这本书以平民视角系统梳理汉代典章制度与民间风俗，比起《风俗通义》，涵盖的内容更加庞杂。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来解释一下“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月亮不失去形体，被遮蔽后会重新明亮；长江汉水不失去源头，堵塞后会再次畅通。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而文脉不绝，核心在于始终坚守自身的根本道义、文化本体与精神本源，纵使其间遭遇时局昏暗、发展受阻的低谷，最终总能拨云见日，这就是所谓的“蔽而复明、穷而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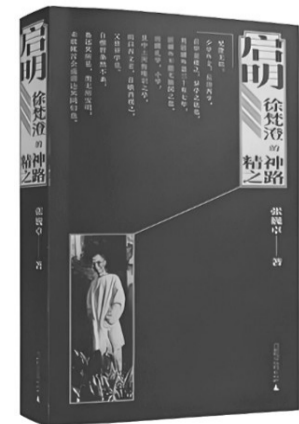
东汉覆灭后，华夏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分裂动荡，而后便孕育出繁荣鼎盛的大唐盛世。这段历史，恰好印证了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文明本体恒久不变，发展脉络奔流不止，纵使路途迂回坎坷，终会走向兴盛光明。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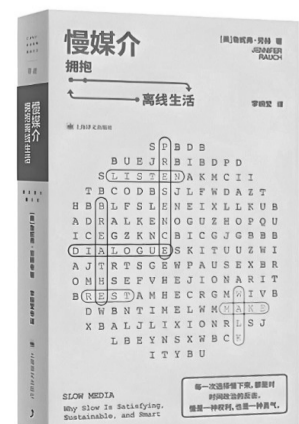
《文物医生: 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
中信出版集团

伴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火，文物修复师这个特殊职业得以进入大众视线。本书收录了青铜、陶瓷领域十则真实修复案例。如今，文物修复不再只凭传统手艺，AR、AI、CT等现代科技成为重要辅助技术手段。沉默的古物经过修补，再度“开口”讲述千年往事。



《启明: 徐梵澄的精神之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梵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具独特性的学者。旅居印度期间，他潜心钻研韦檀多学、瑜伽学，译释大量印度古今经典，被誉为“现代玄奘”。他以印度精神哲学反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开辟出全新的精神哲学格局。这本书让我们得以走进徐梵澄，了解他的思想，汲取丰厚的精神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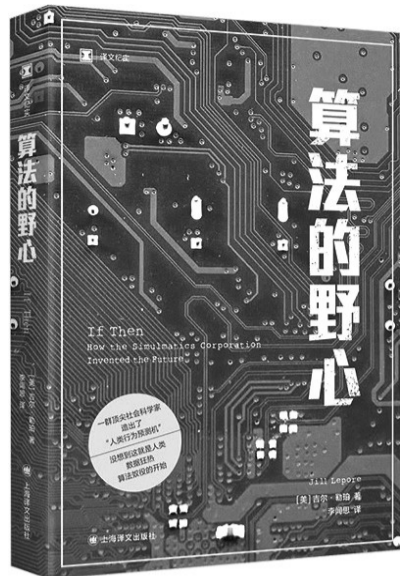
《慢媒介: 拥抱离线生活》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数字化时代下，人人深陷快节奏的裹挟之中。基于此，美国林菲尔德大学媒体研究教授安妮·劳赫，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断网实验：摒弃数字设备与网络，依托“慢媒介”重塑与世界的联结，让人们回归本真生活。

看完这本书，也许你能找到久违的“慢”，优雅而滋润地躺平。

半个多世纪前的大数据算法骗局

江晓原



健康状态，必然导致明显的“基因歧视”，所以也面临着各种法律限制。

怎样才能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并且分析处理这些信息，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出现，预知未来的古老梦想又一次被激活。当时美国的一伙科技精英，做了一场疯狂的尝试，他们试图利用当时已经出现的IBM计算机，通过模拟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达到预知未来、操控未来的目的。

1959年，这伙人成立了“动模公司”(The Simulmatics Corporation)。“动模”是由“模拟”(simulation)和“自动”(automatic)合并成的新词。公司鼓吹这样一个神话：他们可以用计算机实现人类行为的自动模拟，这样就可以预知未来，进而操控未来。公司对媒体陈述的理念是：“如果能从足够多的人那里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并输入机器，那么总有一天，一切都或许是可预测的。”公司宣称他们已经为此发明了神秘的机器“人机”(People Machine)——实际上就是当时的IBM计算机加上他们开发的程序，公司宣称这是“社会科学的原子弹”。

当时的IBM计算机还是庞然大物，1962年《纽约时报》为与动模公司合作而订购的IBM-1401计算机就重达4吨。而那时计算机的存储及计算能力，与今天的个人电脑相比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只是那么微小的能力，就已经点燃了动模公司的巨大野心。

动模公司所用的主要“算法”，后来常被称为“FORTRAN语言”，大量采用“如果/那么”(IF/THEN)语句。动模公司相信，依靠他们获得的数据和算法语言，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从商品选购到总

统选举，甚至可以在越南战争中征服越南的人心。

1961年1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出现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动模公司发明了名为“人机”的绝密计算机，并用它帮助肯尼迪赢得了大选。报道再次宣称“这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子弹”。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其实是动模公司的宣传人员，这几乎就像现在在公司炒作时提供给媒体的“通稿”了。

模拟人类行为，预知社会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件虚妄之事。

虽然现在还有所谓的“未来学”，但所做的预言，在“未来”到来之前，仍是无法验证的。如果到时候被证伪，则只能用“研究水平不够”之类的托辞去搪塞。所以动模公司全盛时期所承接的项目，通常都无法获得预期结果，导致公司很快面临困境。

动模公司晚期在越南的业务，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公司陷入困境之后，在美国的业务大幅萎缩，公司铤而走险，投入美国军方的怀抱。1967年，在越南的西贡开设了公司最后一个办事处。这一年，在越南的美国军方项目提供了动模公司年度总收入的70%，公司因此赚到了“比开张后任何一年都要多的钱”。但是，公司给出的“肯定能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赢得战争”之类的预测，听起来振奋人心，结果众所周知，仍是虚妄。公司的心理战项目也无功收场。

至于动模公司帮助肯尼迪成功当选总统之说，虽然一度广为传播，却难以有继。如果肯尼迪真的是靠动模公司神秘的“人机”而胜选，那么这不是民意所归呢？难道民意是可以被操纵的吗？这听

上去和“选举舞弊”非常接近。

动模公司于1970年宣告破产，但它留下的理念——采集大数据/用算法模拟人类行为/预知未来——此后仍然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既然预知未来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那么动模公司只是这个古老梦想的一次新工具尝试而已。动模公司的尝试虽然失败，但今天人类已经拥有了能力超过当年的计算机无数倍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会不会有人来做新的尝试呢？

事实上，这样的尝试络绎不绝，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剑桥分析。201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英国公投脱欧，另一件是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背后居然都有剑桥分析黑暗的身影。这家小公司虽然只存在了5年，但非法获取了超过5000万人的公众个人数据，并以此作为班农等政客实施心理战，手法极为卑劣。事情败露后，剑桥分析宣告破产，Facebook则因向剑桥分析泄露用户数据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处以50亿美元罚款。

和当年动模公司不同的是，如今剑桥分析之类的“咨询公司”“数据公司”都不再以“预知未来”作为号召。因为以此作为号召就必然要作出预测，而任何预测都会面临实际检验，当年动模公司就是因此而败。剑桥分析将业务放在窃取公众个人数据，利用这些大数据操纵观点、引导关注、买卖信息、分化选民、分裂社会。这些行为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就是“破坏民主”，动模公司的“人机”就是“让人类在21世纪初陷入困境的机器的最早版本”，而动模公司就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仙逝已久的白胡子祖父”。

半生编书 一世书痴

张洪

拜编辑职业所赐，组稿联络、审读加工、揣摩冥想已成为我日常三大要务。人生几何，三角四边，看书翻稿全天候，我阅读读我恒在，让自己渐变为不折不扣的书痴一族。

因由历史考古学的兴趣，我为苏秉琦、郭大顺先生编辑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追寻五帝》等书，相继获得首批及嗣后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与李勤璞、张国庆、武玉梅教授联合申报《大隐楼集》《辽代石刻文续编》《医问先生集》，3次获得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受邀出任特约编辑，编译校订了柏杨、废名、葛浩文、弗洛姆全集等作品。策划的《日本侵华战争》《春归库布其》等书相继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年度中国好书，开辟了国防大学徐焰教授“铁血”品牌。文史类图书回顾丛书已持续十余年，经林建法主编邀稿自

选系列推出3集15种；《吴大澂全集》辑录、校勘、《万历邸钞》点校，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新日汉词典》修订版第二次列入国家辞书规划，市场累计销售过百万册；与东北大学合作技术哲学丛书汉译西方专著，三辑共推出15种……

从师习艺，编辑行业最便捷、最受益之处莫过于此。参会纪念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张忠培、严文明、苏梵之老师高台讲话让我受训良多，务实求真而不飘浮躁虚，愈加培育出我的好古怀旧情结。详细读过外文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明强翻译的《国际出版原则与实践》，十年后在北京培训班上聆听其授课，交流中更添感性理解。入得任继愈、钱逊、周桂钿、覃肇、王千卿、汪毅夫先生家中厅堂，听学人翻译家

悉心点拨，没齿难忘。雪涛博士上世纪90年代曾经关注过版翻译图书，先后与陈乐民所长在《读书》上刊发了批评文章。邹韬奋、陈原、范用、巢峰、沈昌文等著作，勉力撰写体会文章，礼敬前辈同时又深得滋养教诲。练笔写作论文又以书评书话，致力学术出版，当面问询孙郁、荆孝敏、李岩学长，更是一直以来心中理想所系。

与年轻同行共同成长，是我多年来的心愿。时贤俊杰们业绩远超前一代，制作出精彩超乎想象的图书，实感我心。吾辈编辑，与书为伴，煮字生涯，干的都是手眼不抬闲之活计，凡是有益于选题课题、有助于作者读者的举措，决不推脱。从不马虎。旁搜远绍，另辟蹊径，斟酌掂量，成如背后乃艰辛劳动，留下遗憾出现闪失在所难免，甚至无法补救匡谬。历经曲折终

未推出的航母辽宁舰报告纪实、齐邦媛还乡文丛、百年考古学选集，眉间心头惘然依然。惟愿后来者御风而行，再谋新篇。

30多年前，1992年10月，《光明日报》专刊“读书与出版”面世，黄宗江撰文以贺并道出读书难、出书难、买书难“三难”命题，如今大概可以更名为“三易”了。容易平常背后如何易中求深、平中见奇？基本完善、比较准确，笔而统之的夸赞声显，个人创见又隐身在哪儿？秉持传承力量的精品力作、经典名篇怎么琢磨打造？编辑同仁的精神向度、思想品位安放何处？使深阅读的劲儿，做浅阅读的书，退而不休、笔耕不辍的李景康老社长如此支招儿。爱书者、出版人自在在写实写意间凝神修炼，方能于疑问压力间寻到工作妙谛，自如挥洒，臻于佳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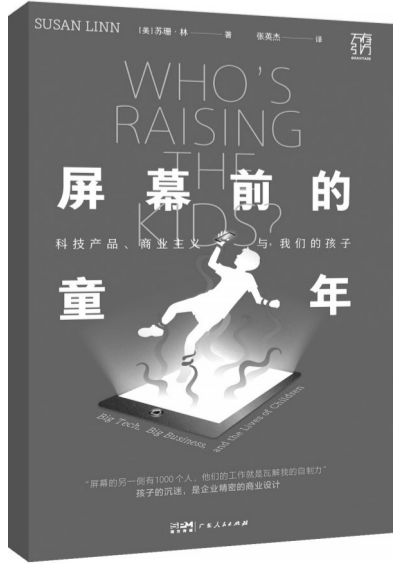
当童年成为一门生意

阿唐

提示

2020年，苏珊·林埋头撰写这本书时，疫情正蔓延开来。在线教育骤然兴起，孩子们的屏幕时间暴增。

6年过去，屏幕对童年的入侵远甚于苏珊·林落笔之时。游戏、在线课、短视频平台层层叠叠，中国家长面对屏幕的依赖与焦虑，已非2020年时可比。这本书能帮我们厘清焦虑的源头，夺回主动权。



双重夹击下的童年

苏珊·林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研究儿童游戏与商业文化超过20年。她在书中指出，当今儿童处在“监视资本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的双重夹击下：科技行业为盈利挖掘个人信息，助长前者；大型企业以股东利益为首要职责，维持后者。两股力量合流，形成了“消费资本主义”——一种由消费驱动，同时也受到消费支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

要让这套体系维系下去，就必须不停地敦促人们购买。企业通过模糊“欲求”和“需求”之间的区别来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而儿童从一开始就是最容易被骗的对象，因为他们还不具备区分两者的能力。书中指出，1985年，“销量排名前10的玩具都与儿童媒体节目有关”。这不是巧合，而是一套成熟模式开始运转的标志。从那以后，可梦从游戏延伸至零食、文具、服装，小猪佩奇不仅占领了屏幕，还占领了睡衣、水杯和儿童牙刷。如今，这套逻辑已完成从线下到线上的迁移，智能音箱、在线教育、开箱视频……无一不是企业精心设计、旨在高额获利的商业计划。

数据是这套模式运转的燃料，隐私是它的代价。当孩子在游戏中注册账号、创建角色、完成任务的那一刻，信息就被收入

囊中。以亚马逊为例，它能够无限期保存一个孩子从幼年到成年的信息，而这些可能被存储并用来精准投放广告。

精密裁剪传递的偏见

苏珊·林引用20世纪初的一场教育观分歧，来追溯这套逻辑的思想根源。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主张，学校应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好奇心、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百货公司巨头法林则认为，公共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打造一支顺从的劳动队伍。两种教育观的分歧延续至今，但法林的观点显然占据了上风。屏幕正在成为这套“教育”最有效的载体。这种教育视角下的世界，看似真实，却经过精密的剪裁。当孩子每天花数小时面对屏幕，他们也在吸收屏幕背后的价值观。这种裁剪传递了偏见。商业产品将偏见包装成娱乐内容，不需要刻意灌输，只需要持续出现在屏幕上，就会慢慢变成孩子理解世界的方式。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抱持环境”的概念：孩子需要一个既不被过度刺激，又有足够安全感的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当孩子持续被商业信息轰炸时，他们失去的正是这种空间——靠自己让事情发生的体验。苏珊·林认为，最好的玩具应该是90%

由孩子主导，只有10%是玩具本身在“表演”。而今天大多数电子玩具恰恰把这个比例倒置了，它们做了太多事情，孩子反而无事可做。

用耐心给出的朴素答案

减少屏幕时间；3岁之前不主动把屏幕交给孩子；在家庭内部划出“无屏幕时间”……苏珊·林给出的这些建议，其效果高度依赖家庭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资源越多的家庭越容易执行，资源越少的家庭则越难。

苏珊·林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建议的局限性。在一次采访中，她用18世纪英国废除非洲奴隶贸易来进行类比：12位贵族教会决定结束奴隶贸易，花了70年才做到。这意味着，最初的倡导者很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她说，对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并继续为之努力，是很重要的。

书的结尾回到了一个朴素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东西？苏珊·林的回答，朴素得几乎不像一个学者的判断：时间、空间与安静，与最爱他们的人接触，用所有感官探索世界。这些事情不需要屏幕来完成，但它们正在被屏幕一点一点地蚕食。

所以，问题或许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我们究竟是谁？